

福泽谕吉与孙中山改良思想比较研究

覃 启 勋

19世纪后期,西方先进文明东渐,来势迅猛。亚洲的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丧权辱国、失去独立而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要么主动吸纳西方文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发展民族政治和经济。福泽谕吉和孙中山选择了后者。但是,二者改良思想的历史文化背景殊异、改良思想的内容和重点有别,致使改良的结果亦大相径庭:福泽在将日本引向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同时,助长了日本民族扩张主义,给包括日本民族在内的所有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战争灾难;孙中山却因改良的失败而走上了激越的革命道路,推翻了清王朝的长期统治,为推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世界近代东方文明史上,福泽谕吉于1885年(明治18年)前后在日本从事近代化的改良事业,孙中山于1894年前后在中国从事近代化的改良事业。应该说,这是有涉中日两国的重大事件。故此,本文拟就二者的改良思想作些比较研究。

研究福泽谕吉与孙中山的改良思想,必先考察二者从事这一实践的母国历史和文化背景。这是因为,他们改良的对象是他们的国家,而国家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有两点必须重视:其一,“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以求弄清其“基本的历史联系”;其二,弄清该国的文化“在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①。

长期以来,福泽谕吉被日本民族尊奉为近代启蒙思想家,本文对此无有异议。纵观日本文化发展历史,福泽谕吉所从事的近代改良活动的意义堪与大化改新前的圣德太子相比拟。从公元5世纪中叶起,日本继体、钦明朝内乱,加之败北于高句丽,造成其土著文化的日渐颓靡,从而形成一种定势——日本必须借重外来先进文化,实行文化转型。完全可以说,最先看破这一定势的人就是圣德太子。公元592年,推古即位,翌年,圣德太子摄政,很快就展开了文化转型的伟大实践,即全面吸纳先进的中国文化,将土著文化的合理成分保留下来,二者融汇,催生出了一一种新的日本文化,这就是日本第二个文化阶段即和汉组合型文化阶段。公元603年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公元604年圣德亲撰的《宪法十七条》,就是日本单一土著文化阶段结束的象征。与之相应,也是日本和汉组合型文化阶段肇始的标志。自此以降,直至化政文化,均属和汉组合型的日本文化。这就是福泽谕吉从事早期改良的历史文化背景。那么,这种历史文化推演而成的日本近代现实背

景又是什么呢?兹仅就其内乱和外患略述几例。先看内乱:1864年,水户天狗党之乱爆发,水户藩的攘夷派藤田小四郎于筑波山发难,武田耕云斋在赴京途中被加贺藩降伏,另有寺田屋事件、“8·18政变”、池田屋事件、蛤御门之变相继发生。外患方面:萨英战争爆发,英国调动7艘舰艇炮轰鹿儿岛^②;1864年,西方列强四国舰队又在炮轰下关^③后,陆战队强行登陆,长州藩被迫投降,并由幕府与之签约赔偿美金300万元!

如前所示,中国孙中山的改良较之福泽氏要晚10余年。毛泽东曾经讲过:“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卅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④当然,这是孙中山先生在从事改良之后转为正式革命的结果。孙中山的初衷是改良而不是革命。那么,孙中山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背景上从事改良的呢?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分析:西周以降,秦、汉、魏、晋、南北朝以统一和分裂相承续,隋、唐勃兴,宋、元、明则由鼎盛渐趋衰落。有清一代,康、雍、乾盛世乃是旧有社会的回光返照。孙中山改良前的现实状况则是: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在具体分析福泽谕吉与孙中山改良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背景的基础上,必须指出:第一,近代西方列强是用大炮这一特殊血铁工具给华夏和扶桑送来近代西方文明的。但是,在接受这一先进文明的过程中,中国无论在损失和付出的代价还是蒙受屈辱的程度方面都比日本大得多。第二,早在公元645年前后,日本已取得主动吸纳中华先进文化的“大化改新”的宝贵经验,并成功地完成了文化转型的伟大实践。中国则尚处在殷周以降华夏文化的不断自更和完善阶段,缺乏以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为特征的文化转型实践。因此,西方文明一旦逼近,不仅显得漠然迟钝,而且被动挨打。第三,清朝统治阶级腐败,任人割地索款、丧权辱国、麻木不仁、夜郎自大,且号称“天朝”;日本虽亦于外交场合和教科书中自称“大日本”,但客观存在的地域狭窄和资源贫乏,铸就了日本民族的危机感和羞耻心。所以,只要比日本好的,一概吸纳无遗,“大化”以降,从未止辍,由此转化成了极可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第四,如果说古代的圣德太子的改新实践的本质是主动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那么,福泽谕吉的改良本质则是主动学习近代西方文明,有古代经验可资,故对福泽来说只是一种循圣德之法的事情;但对孙中山来说,此前康、梁之作不足为训,以外国文明改良清王朝,实施近代文化转型,概无本国经验可循,可谓利害之大,困难之多。以上四点,是从本部分概括出来的基本看法,明言之,旨在对福泽谕吉和孙中山改良的各自主要背景扼要把握。

二

二者的改良思想是什么呢?

(一) 关于福泽谕吉的早期改良思想

福泽谕吉的早期改良思想形成,有赖于他的勤奋好学和游历中西。当欧美列强以火炮轰开日本国门之时,福泽还处在豆蔻年华。出身下级武士的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对日本民族的凌辱和压榨,深刻体会到了旧有体制的没落和腐朽,向往和平安泰、谋求民族独立和振兴自己祖国的强烈愿望应时产生。他汉学功底厚实、兰学才能出众,且英语基础牢固。因此,在1860年(万延元年)应幕府使节木村摄津守之邀同访美国50余日期间,直接感受到了近代东西文明的巨大反差和日本的落后。1862年,游历法、意、荷、德、俄、葡等国历时一年,就其文物制度进行了全面考察。这种经历,是其改良国政思想得以萌生的主要契机。他轻入仕而重教育,曾言“欲谋东洋之革新,必先输入西洋文明之教育!”^⑤因此,主办庆应塾学,以培养人才为先务。其著述颇富,但最能代表他早期改良思想的是《文明论之概略》(1876)和《脱亚论》(1885)。

这里,扼要分析一下《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的主要内容和关系。福泽谕吉认为,文明“难于言表”^⑥,因为文明有广义、狭义之别。狭义文明单指增加人类的物质需要,增多衣食住之虚饰;广义文明“不仅要追求衣食住之享乐,还要研智修德,使人类上升到高尚之境界”^⑦。他还认为,文明具有不断发展的特质,故人类应该不断舍其旧而新是谋,此即《文明论之概略》有关“文明”最切紧要的观点。此外,福泽谕吉还将文明分为“个人文明”和“国家文明”两个方面。智德兼备者为文明之人,“全体国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尊严”为文明国家。同时他还强调,学习西洋文明,“必须适应本国的人情风俗,斟酌本国的强弱贫富”^⑧。概言之,《文明论之概略》从理论上阐释了文明的定义、文明的类型及吸收西洋文明的原则。

福泽谕吉在50岁时(1885)所写成的《脱亚论》系统地提出了改良国政的种种观点。有的文章认为福泽氏之《脱亚论》代表了他“后期思想之豹变”，并将全文要旨视为“民族扩张主义”^⑩，似欠妥。如此说法的根据在于：《脱亚论》的要旨是吸收西方近代文明以改良日本封建国家，此外才是民族扩张主义。请看：

《脱亚论》之文首即称：“世界交通之道已便，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草木风靡。唯西洋人物，古今大异，其举动古代迟钝，而今朝活泼。唯乘势利用交通利器而已。”很明显，这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讴歌赞颂。接着，福泽氏认为，应“顺应社会（潮流），与文明之海同沉浮，共扬文明之浪潮，同享文明之苦乐，除此之外，无另所求”。应该说，这是饱受战争之痛苦、阅尽落后之悲哀的福泽氏对和平和文明的礼赞。至于“麻疹”，似在以事喻理，斥责腐朽的时政。“西洋近时文明进入我们日本，以嘉永之开国为发端。国民约晓必采，渐催活泼之风，然有古风老大之政府拦截进步之道”。这是在揭露落后的政府阻碍西洋近代文明在日本的传播。这里应该特别指出：《脱亚论》认为，“不保留政府，文明就决不能进入。无论如何，近时文明与日本旧套不可两立，如果脱离旧套，那么政府也要废灭，如果那样，那防止文明，禁止其侵入，日本就不能独立，呜呼！世界文明之喧哗繁剧已不容许东洋孤岛独自沉睡！”显而易见，福泽氏既想保存现存政府，又想吸纳西方文明，既担心脱离旧套后政府垮台，又担心禁止西方文明进入而导致民族颓废而无法独立。其矛盾冲突之心理，跃然无遗。正是在这种矛盾冲突之后，才大声疾呼：“於此，我们日本士人基于重视祖国而轻政府之大义，依赖皇室之神圣威严，断然推倒旧政府，成立新政府，不分国中朝野之别，万事悉采西洋近代文明，不但脱出一个日本之旧套，而且要在整个亚洲推出新招，言其主义，乃是‘脱亚’二字”。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君主立宪制的日本，天皇是国家的象征，统绪古今。因此，拥护天皇，重视祖国而轻视政府，推倒腐败落后的旧政府，成立新政府，在本质上仍是改良。再者，日本乃至整个亚洲的近代（中期以前），较之西洋文明的发达，的确落后了。因此，福泽的“脱亚”，是就整个亚洲近代的落后而言的，他在此企求的是国家的文明和发达。这是《脱亚论》前半部分的主要改良思想之所在。

《脱亚论》的后半部分，以近代亚洲落后为基点，谈到了五个主要问题：第一，“我们日本之国土处在亚洲东边，其国民精神全在脱离亚洲陋习，转向西洋之文明”。毫无疑问，这种论点是反历史的，是对日本国民精神的篡改。日本国民的精神应是务实拓新、勤劳勇敢。第二，“我国与其踌躇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洲，毋宁脱其行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今天看来，福泽谕吉在当时提出这种看法是缺乏远见的，也有置历史上几千年邻国友好相处于不顾之嫌，“远亲不如近邻”，似应今日之日本民族记取。第三，“与亚洲之政教风俗诀别”。稍通日本文化的人都知道，这一说法实欠科学，因日本的政教风俗与亚洲之政教风俗历经几千年的融汇已成血肉联系，不但当时不可诀别，就是现代的日本，仍是文字语言、礼仪谈吐与西方大异。第四，“日本人要以自己的行为，将日本从中、朝分离出来”。分离还是不分离，决不能一叶障目。与邪恶国家分离，则天经地义；与同样落后但向来友善的国家分离，必然造成自己的孤立。第五，“对中朝等亚洲邻国，必效西洋人之法而处理之；亲近老友（笔者按此用反译法，因“恶友”一词可反译。）必共留恶名，我要在心中告别东亚的老友。”应该说，此句话是整个文章后半部分的点睛之笔，本文别的地方要谈及此事，所以，为了节省篇幅和笔墨，在此只想顺录这样几个文字：后羿故事，岂可忘乎？

实质上，《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如果说《文明论之概略》是《脱亚论》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脱亚论》就是在这种理论基础的指导下，对改良日本旧有国政策略的具体阐释。

（二）关于孙中山的改良思想

冯天瑜教授曾说：“刚刚跨入新世纪的中国，风雨如晦。但是，启蒙时代播下的思想种子却在人们心中滋生，在新世纪的雨露下，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当亡命海外的康有为不识时务地依旧在保皇、复辟的死胡同里踟躇徘徊的时候，一大批热血青年迅速离开他，走向孙中山。时代思潮的主旋律，开始由温和的‘维新’转换为激越的‘革命’”^⑪。这里要谈的就是温和的“维新”阶段的孙中山的改良思想。

孙中山“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学，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⑫。由此可见，孙中山之早期也是学贯中西的非凡之人。又据《致郑藻如书》载：“方今国家风气大开，此材当不沦落。某之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

以陈时事之得失。”^③此信写于1890年,故此时的孙中山仅有24岁,风华正茂。他颇有志气,欲以己之才华报效国家。他关心国家,注重时事,表现了一个爱国青年的拳拳之心。农桑之废兴、鸦片之利害、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均被其视为“欲事之实事”。这些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通过书信言表于政界颇有影响之同乡郑藻如氏,足见其改良之心在此以前早已有之。这也是当时“一大批热血青年迅速……走向孙中山”的政治原因。继之于翌年撰成《农功》一文(1893年初刊于《盛世危言》),就农功之勤惰、土壤之改良、肥瘠之调剂、农政之建立、化肥之施撒、良种之选拣、派员赴泰西考察农艺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述,其内容的专一、具体以及深入程度均超过了《致郑藻如书》,可见其改良思想已逐渐形成。又据《致郑藻如书》载:“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事之得失”,足以说明孙中山改良之志已定,上书之意已决,信念不移,可窥一斑。因此,1894年初,即开始上书之写作,至同年6月,《上李鸿章书》完成,其历时半年,且其间先后经陈少白和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等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定稿后,6月偕陆皓东赴天津向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其认真慎重,不言而喻。孙中山的改良思想,在该上书中作了全部表达,兹择其端要,录析如次:

第一,取欧美先进文明,“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蕘之采”。此应是孙之上书的直接动机。

第二,“此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求,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駸駸乎将与欧洲并驾矣”。此乃上书之目的。

第三,“窃尝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国家应抓的紧要之事,即“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

第四,“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有法也”。毫无疑问,人尽其才的关键是兴办教育而培养人才,孙中山将教育之发展列于首位,足见其对人才与教育的重视。

第五,“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地利为生民之命脉,须当平水患、兴水利、辟荒土。兴农学,设农官,用机巧以节人之所劳,方方面面,所虑俱周。

第六,“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在这方面,孙中山游学欧美期间,访睹所得知兴物利民利国之重要。化学物理、气动风电、舟车改良、邮运石碳,凡西方最先进之科技,均上告之,以求当道者仿效致用,开财源而节财流,以兴邦国。

第七,“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碍,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从货畅其流,论及关卡、保商诸事,且力申交通之作用。去繁就简,重商轻敛,方能发展民族资本,增益国家经济财力。

孙中山强调以上作法,是因为“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只有抓好这四个方面的要务,才谈得上“修我国政,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如此理国,“欧洲其匹哉!”。孙中山改良思想之宏旨,概在于此。

当我们条析福泽谕吉与孙中山的改良思想之后,理当就其同异稍作分析:

相同之处如次:

首先,福泽谕吉与孙中山的改良手段和基本目的一致。因二者均游学西方,对其近代先进文明了若指掌,感其国邦较之西方文明程度相去甚远,故欲取西方近代文明而振兴自己的祖国。

其次,国之将兴,教育为本。福泽方面,轻入仕而重教育,主办庆应义塾,大力培养人才,乃是一例。孙中山深感“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敦促秉国钧者必留心教育。

其三,发展科技,增强国力,为民族独立而奋发。福泽旅欧途经香港,亲睹英欺辱华人之惨状,即发誓言:宁死也不为人奴!他强调学习西方科技文明,但却特别注重国家和民族独立。他认为,没有国家的独立和文明,个人的文明便无从谈起,进而指出:日本的独立,“其唯一的方法,在于明确目标,向文明前进”^④。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中奋笔疾书:“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此外,还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指斥西方列强对华夏的野蛮入侵和瓜分:“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孙中山即以改良之时如此大声疾呼,可见民族独立之尊之重。

第四,改良重点,在于改良腐败政府,拯救祖国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福泽谕吉称无能守旧之政府为

“古风老大”，认为只有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方能吸纳西方文明以振兴祖国。孙中山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对腐败的朝廷官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

相异之处如次：

首先，改良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实基础有着重大区别。如前所述，日本历史上的大化改新，几乎全盘袭用了中国的隋唐先进文化，成功地完成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转型。大化以降，善于吸纳外来先进文化已渐次形成日本民族的特质。因此，近代西方文明逼近之时，则在日本展开了一场“脱亚”与“兴亚”的论争，因日本民族固有的特质所在，以福泽氏为首的“脱亚派”战胜了以樽井为首的“兴亚派”。从1885年“大阪事件”使“兴亚派”的人士下狱一事来看，福泽在论争中是获得了政府的支持的，这种支持，本质上就预示了福泽改良的巨大成功。中国方面，千古一贯的文化自更和完善，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和保守。民族自尊是可歌可泣的。但是，更应看到，如果民族自尊与民族保守一旦结合而不可分离，那么就会以妄自尊大而拒御外来先进文化，甚至会毫不珍惜地将自己的文化精华无原则地馈赠他邦以显其国大财丰。孙中山改良的历史文化基础若此，怎可迅即见效？况且，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虽殚精竭虑半年写成，但“偕陆皓东赴天津向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未获接见”。诚然，光绪二十年（1895年）《万国公报》月刊第六十九、七十册连载了该上书，但并未引起政府的应有重视和文化舆论界的广泛讨论。

其次，改良思想中，在兴工兴农方面侧重有别。福泽谕吉虽然于《脱亚论》中未言及工农行业之事，但明申了“不分国中朝野，一切万事悉采西洋近时之文明”。众所周知，近代西洋文明即是工业文明。日本自大化以降，其文明主要是农业和渔猎文明。当福泽鉴于列强入侵、日本穷困均由日、西文明之差距所致，故开宗明义地道出了“悉采西洋近时文明”，以发展日本近代工业。孙中山重视西洋文明的吸纳，但更重视学习西洋农耕稼穡，以发展中国的近代农业文明。他本身学医，何以如此重视农业的改良呢？自古以来，中国的主体经济乃是农业经济，故以文化传统的影响所致，此其一。孙中山青少年时期出生并身居于广东香山邑，耳闻目睹者多为农桑之事，故又以周边环境的影响所致，此其二。考之履历，孙于西方求学期间，对西方专设农官尤为感触，加之近世中国农政废弛，不兴则兆民无以生存，此其三。此外，改良重农之事在孙中山的著述中也不乏其证。兹举几例：《致郑藻如书》云：“呜呼！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为害，亦已甚矣！远者无论矣，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砍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蚕桑则向无闻焉，询之老农，每谓土地薄……”。1891年，孙中山专撰《农功》，就农政作了系统论述，以期“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出入有节，种造有法”，而达到国财恒足的目的。《上李鸿章书》专辟一节，论述地尽其利、农政有官、农务有学及耕耨有器，亦可为证。

第三，改良思想中有兴国和扩张这一原则区别。论及兴国，福泽与孙中山文旨同具。但是，福泽氏的《脱亚论》的后半部分，无论怎么讲都有其历史的反动性。在这后半部分中，至少有以下反动观点：一是“与亚洲之政教风俗决裂”，此在前文已作评述，这里只想补充：亚洲之政教风俗也包括日本民族的政教风俗，如果将其纳入文化的范畴，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总不会百无一是吧！既然如此，与之决裂从何谈起？二是对亚洲各国“唯有效西洋人对待之方法处理之”。这里没有明言“扩张”，但近代的西方列强对亚洲炮舰政策还实施得不够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泽的这一句话的含义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至于文章结尾一句，笔者只能说，“恶友”乃至“恶名”，可由历史予以认定。孙中山是理智的，他的改良，就是兴国安民振兴百业。一篇《上李鸿章书》，都是讲的借重泰西文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诚然，他也讲到了日本：“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以能举其四大纲而举国行之；而无一入阻之”。其以日为师之义何用赘述？

三

福泽谕吉和孙中山的改良思想，给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亚洲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中国方面，孙中山的改良没有也不可能成功。但是，正是这种不成功，促使孙中山从温和的维新改良走

上了激越的革命道路。接着,组织广州起义,失败后,退至日本,奔波于欧美及南洋诸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尔后又发动惠州起义,在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并被选为总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统治,他又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继而改组国民党,1921年担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当陈炯明叛变以后,因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得以再次改组国民党,将旧的三民主义改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并建成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他亲自成立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军事骨干。总之,其早期改良虽没成功,但他的革命,推倒了清王朝的长期统治,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和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其改良和革命业绩永垂青史。

福泽谕吉的早期改良思想功过分明。其功在于促进了日本由封建社会晚期成功地完成了明治维新和日本文化的第二次转型,使日本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因其对亚洲各国“唯有效西洋人对待之方法处理之”的影响,日本民族扩张主义形成,致使日本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邻近周边的友好国家当成了“恶友”,大肆侵略,野蛮戮杀,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这场战争给日本民族又带来了什么呢?福泽谕吉若在九泉之下得知以下数字,也会捶胸痛悔的:1. 生产飞机 62 000 架,损失 50 000 架;2. 生产舰艇 827 艘,损失 684 艘;3. 军人军属死亡 1 555 308 人,负伤或下落不明共 309 402 人;4. 国家财产损失折合为 49 673 611 000 日元^⑨。此外还蒙受了原子弹的灾难。即便如此,福泽谕吉仍然不失为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前世之事,后世之师。历史既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历史上的好事,后人必讴歌、继承之;历史上的坏事,后人必指斥、唾弃之。无论改良或革命,都有相应的历史回报和报应,此乃铁的规律!

(此文的撰写,得到了冯天瑜教授的学术指导,谨此致谢。)

注 释:

-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 ② 生麦事件:1862年,萨摩的岛津久光从江户回归,在横浜的生麦村杀伤了英国人。
-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6页。
- ④ 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 ⑤ 《福泽谕吉全集》第16卷,第207页。
- ⑥ 《文明论之概略》第3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 ⑦ 参《文明论之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页。
- ⑧ 山林秀雄:《思考启示录》,文春文库107—1,第129页。
- ⑨ 《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日本文化的历史综迹》,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 ⑩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73页。
- ⑪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
- ⑫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
- ⑬ 《文明论之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0页。
- ⑭ 《图说资料日本史》,浜岛书店昭和57年版,第115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